

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

刘仁营, 裘白莲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以人的发展与实现程度为坐标,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为异化生产力和自主生产力两种历史形态。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所追求的,不是生产力的无原则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由异化形态向自主形态的转化。由于马克思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坐标上已经开始收缩生产力拜物教思想,而国内的经济“主流”们却食洋不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因此,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当代形态,即科学发展观,走出生产力拜物教思想的禁锢,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

关键词:生产力;拜物教;人;自由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078-05

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态

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哲学和唯物史观研究的核心主题。以生产力发展对人的解放的不同意义,以及个体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的能动程度两个方面为参照坐标,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为自主生产力和异化生产力两种基本历史形态。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经过了原始的地域性自主生产力、近代的社会化异化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自主生产力三个历史阶段。

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脱离了“为了人”这个目标,“为生产而生产”,为赚钱而赚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像资本家这样的人都成了资本的奴隶的话,那么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则是本末倒置的,是不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个终极价值目标的,这样存在的生产力就是异化生产力。相反,如果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以大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而是以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为目标,更加有利于人类个体能力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经济民主权利,能够自由自觉地为社会和自己创造财富,这样存在的生产力就是自主生产力。异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对人自身的价值的牺牲为代价的,其必然为一种自主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的自主生产力所代替。

马克思的理论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是生产力的无原则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由异化状态发展为自主状态,从而实现人的能力和关系的全面发展。因此,异化生产力理

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的关键和枢纽所在。遗憾的是,人们尽管较多地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但马克思的异化生产力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这种忽视造成的理论偏见也是根深蒂固的——似乎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无原则地合理的,只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只要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任何人类社会问题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而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直接和间接地与这种偏见有关。因此,重温马克思的异化生产力思想,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异化生产力思想,最早出现在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批判继承过程中。马克思指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象人一样从事活动因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1]马克思虽然采纳了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但却对其进行了科学改造。马克思将李斯特生产力概念中的精

* 收稿日期:2008-05-21

作者简介:刘仁营(1977-),山东青岛人,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经济哲学。

神性要素剔除掉,并将其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批判了圣西门主义经济学家和李斯特对工业生产力的“狂热赞美”。但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分析异化生产力的成因。

在作为唯物史观形成标志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异化生产力形成的技术原因和制度原因。异化生产力形成的技术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导致的高度社会分工;异化生产力形成的制度原因,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生产劳动由分离的个体生产劳动转化为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作为人的生产能力的生产力转化为一种外化的客观的物质力量。而由于产权的私有制,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丧失了支配权,导致个体劳动者与其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支配权相分离,于是外化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统治人的异化生产力,生产力由自主形态转化为异化形态。针对生产力的异化,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2]73}由于个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与每一个个人相分离的外在力量,“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而不是受他们自己支配的他们自身的力量。在这种异化生产力与个人之间的唯一的纽带——劳动——就只能是一种不断创造庞大的外在异化力量的活动。针对劳动者与这种异化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批判道:“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2]74}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

那么,如何才能消灭生产力的异化性质,重新获得生产力的自主性,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互为代价呢?针对上述两个方面原因,马克思提出了消灭社会分工对人的制约和消灭私有制两个根本目标。对于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做了前瞻性的历史展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也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

结合的主人了。”^[4]可见,在扬弃了生产力异化性质的自由自觉状态,私有制的消灭不仅使得人类重新控制了自己的力量和关系,而且人性原则、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成为生产活动的根本性原则,经济活动的效率原则和人本原则真正地结合了起来^[5]。

二、生产力拜物教——生产力异化存在的经济学反映

由上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无原则地肯定和强调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完全依赖于这种发展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带来的现实效果。然而,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开始,到今天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根本点,将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一种生产力拜物教思想,企图为自己的主张寻找正统理论支持。他们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却在现实实践中偷梁换柱——“打左灯,往右转”,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理论根源上澄清这一事实,揭露这种假象,是学术界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生产力拜物教,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存在决定的,这个特定的经济存在就是异化生产力。生产力拜物教的系统化理论化形态,集中体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中。中国的生产力拜物教思想从理论根源上则直接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尚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那里,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已经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为生产而生产”的效率原则,成为李嘉图经济学至高无上的唯一的原理。在经济行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物质资源,整个资本主义工场就是一架“无人”的大机器。这架大机器的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为李嘉图追求的唯一目标。但李嘉图也承认,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财富分配的极端两极分化,生产成果为极少数人垄断和分享,而大部分劳动者只能分享贫困。对这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悖论现象,有人模仿“斯密问题”的称谓而称之为“李嘉图问题”。针对李嘉图效率至上主义的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当时的学者西斯蒙第一方面肯定了李嘉图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对其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给予了坚决的批判。他说:“我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我们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险的保障,他必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6]可见,西斯蒙第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生产力原则,而是反对生产力的异化性质,即以大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而不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经济需求。西斯蒙第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应该说是

古典经济学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西斯蒙第这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分析问题的思路,和马克思的异化生产力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克思给予西斯蒙第这个思想以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7]西斯蒙第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异化性质,并且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不合乎人道要求的,而且因为将有效需求减少到最低程度,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所以是不能持久的。马克思正是在西斯蒙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导致异化的制度原因——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然而,很多人并没有看到马克思与西斯蒙第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将西斯蒙第完全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式的道德空谈,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误解。

由于西斯蒙第尤其是马克思对生产力拜物教思想的猛烈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古典自由主义那种完全“敌视人”的经济价值观进行了理论上的修正。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的分析,这种修正的结果就是“帕累托标准”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一种普遍价值标准的确立。可见,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完全摆脱伦理观念的“价值中立”科学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帕累托标准主张在没有人收入减少的前提下经济总量的提高——社会经济总量可以提高,但不能有人因此而变得更加贫困。按照帕累托标准,一种经济改革措施如果使得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变得比原来富裕,而其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比原来贫困,那么这种改革就是一种“改进”,就是合理的。很显然,帕累托标准是一种在量上允许任何差距的判断标准。它所坚持的“公平”是一种“最起码”意义上的“起点公平”。但即使这种最弱意义上的公平,在经济现实中也往往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于是,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相对“后退”的构想,例如“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尽管有一部分人(可以是大多数或是极少数)的财产或财富会因此减少,但如果受益者所得(在数量上而不是在事实上)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失,这种变革就是合理的。

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于原来那种赤裸裸的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已经有所收敛,它开始想方设法在不减少劳动者财富的基础上追求资本家的利益。然而,即使是这种有所收敛的生产力拜物教思想,仍然受到西方和东方制度学派、激进主义、福利主义经济学家,例如缪尔达

尔、加尔布雷思、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的严厉批判。缪尔达尔认为经济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种“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阻碍,因此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其价值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的平等和经济的进步。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必然导致“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产品的实际效用如何。因此,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要,考虑公众的利益”这样一个“公共目标”,把人们从正统经济学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实现“信念的解放”。斯蒂格利茨在《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型制度框架》的报告中,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新的经济正是以这样一些事实为基础的:多数人认为如果整体经济提高了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受益,但实际上他们的受益是不平等的,这种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不利于国际稳定和持续发展。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型。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正在强调社会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8]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主流”们却并没有认识到生产力拜物教思想的危害,更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正在逐渐摆脱生产力拜物教思想的禁锢,他们要么宣扬帕累托标准这个理想主义,要么用所谓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来搪塞,宣扬所谓的有了效率公平自然解决的“效率万能论”,或宣扬必须以牺牲一代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必要代价论”等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私有制崇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万能论思想成为他们的“圣经”。这是一种食洋不化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哲学。我们必须从这种根深蒂固的生产力拜物教思想中走出来,避免或减少它给我们的改革大业造成更大的危害。

三、科学发展观——继承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真精神

针对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党在十七大上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在改革实践中贯彻从根本上“继承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经济哲学和唯物史观的新境界和当代形态,因为科学发展观全面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主题、价值主旨和根本方法,并且为马克思经济哲学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指出了基本实现路径。

首先,科学发展观凸显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主题。科学发展观形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新阶段,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新观念的集中概括和理论升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两个基本原则。如何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科学发展观

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笔者前面也指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问题。可见,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实践的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是其统一性的体现,经济进步以人的发展为代价或者人的发展以经济落后为代价是二者之间矛盾对立性的体现。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阶段,针对新的历史现实,以新的形式重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核心主题,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

其次,科学发展观弘扬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价值主旨。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看来,社会生产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客观的外在制约性的方式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必须将生产劳动的客观制约性与以人为本的目的性、能动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位置。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哲学。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目的,而不是把经济建设当作人的目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人而生产”。“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成果由人民分享”,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理念。这种发展理念扬弃了将经济增长看作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思想,也就是扬弃了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在特定情况下,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这两种价值目标未必针锋相对^[9]。例如,在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这种经济理念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需求的关注,就是以人为本的。但如果只注重生产效率,不注重对产品的分配比例进行合理的调节,就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严重差距和两极分化,影响人自身的发展,反过来阻碍经济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极端化的体现。因此,如何处理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关注的共同问题,但我们没有必要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在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问题上,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平衡、协调、和谐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总是以牺牲另一方面为代价的极端化道路。

再次,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思维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社会和人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10]27}。而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也坚持社会生产劳动方式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

观点,坚持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通过这种相互作用推进二者的不断进步。因此,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法,即辩证思维是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哲学在思维方法上的共同特征。

最后,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历时态”意义上的统一,而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内在的、“共时态”意义上的统一,从而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坚持实证分析的首要地位,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规范分析。马克思用“铁的必然性”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工人在资本统治的前提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改良措施的重要意义。他在用实证分析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的同时,也用规范分析指出异化劳动、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因此,马克思并不期望通过一场革命“一揽子”式的解决方案,而是将经济社会的质变与量变有机统一起来,将质变建立在量变基础之上。同样,科学发展观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10]28}科学发展观反对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悬置起来,要求将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化、操作化、现实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实现的“全过程”,并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信念,而是具体的可以身体力行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四、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

由于异化生产力的形成在制度上离不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因此与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既然生产力拜物教者主张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可以付出任何代价,那么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吗?这个问题是从人类寻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开始,许许多多革命家和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过,列宁探讨过,改革开放后国内的学者探讨过,而在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仍在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还在以欧洲社会为研究模板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存在是一种“铁的必然性”,我们即使认识到这些不同的阶段,也无法跳过和超越这些阶段。后来,随着马克思研究视野的扩大,当他将目光由

西方转向东方社会的时候,他对这种“不完全归纳”做了必要的修正和扩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意义的评价以及对俄国社会的研究中。对于这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虽然慎之又慎,但仍然在原则上肯定像俄国、中国这样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方法论上强调不能将《资本论》中的结论变成先验地判定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罪恶和灾难,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将原先具有的公社所有制保护好,再一个是借鉴采用西方高科技成果。而对于这个新的伟大构想的实现,马克思联系当时的历史形势,将其寄托在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互动方面。

对于马克思设想的具体途径,即进行世界性革命,放在今天来看,也许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但这一点仅仅具有策略意义,并不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最本质的东西。因为革命的互动,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条件的实现,即更好地吸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和保留国内先进因素。因此,如果能够解决技术改造和制度改造两个根本问题,则仍然可以实现原先的目标。而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审时度势,独辟蹊径,引进先进技术早已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经济制度上仍然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因此,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在中国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正在逐渐

变成事实。那些宣扬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宣扬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学者显然没有看到中国所具备的两个根本条件,硬说中国是“打左灯,往右转”,中国只能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种言行不是动机不良,就是愚昧无知。

总之,生产力拜物教思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一套,具有强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我们必须对这种思潮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评,在改革大潮中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避免重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的罪恶之路,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构建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8-92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3.
- [5] 张均德,等.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发展观及其现实意义[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7-81.
- [6]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14.
- [7]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 刘小兵. 斯莱格利茨:中国需要新的发展模型[N]. 经济观察报,2007-03-09.
- [9] 刘荣军. “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6):85-91.
- [10]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D].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荣军

On Liberating Out of Productive Force Fetishism

LIU Ren-ying, QIU Bai-lia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 and the extent of realization as the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is shown as two historical forms, alienated productive force and independent productive force. What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 pursues is not the unprincipl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 from alienated form to independent form.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sts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give up productive force fetishism under Marx's influence, while some so-called mainstream economists in China still confine themselves to old view, breaking away from China's reality. Therefore, we must liberate ourselves from its confinement and transcend capitalist Furcae Caudinae, advocating the modern form of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namely,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ductive force; fetishism; human; freedom